随笔三章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秦　浩（为鳌）

长达8年的抗击日本侵略战争并取得胜利，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不仅使我中华民族从此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也决定了这半个世纪以来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和今后繁荣富强的发展远景。我们这一辈人就是在国难深重的风雨年代里成长的，无邪的童真和如锦的华年都凝结在这烽火连天的岁月中，犹如化石般清晰永存。

第一章　苦　难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首先显现在我眼前的是，日本侵略军强加在我们这一代人少儿时期的苦难生活。

我们嘉定人民遭受日本侵略军的蹂躏，要从1932年1月28日的淞沪战争说起。日军在我爱国军队十九路军的奋勇抗击下，正面进攻上海吴淞口久不得逞，就转攻浏河口登陆，3月3日入侵嘉定。母亲携我兄妹3人雇了一条小船，仓促沿练祁河西行，取道吴淞江到达上海父亲处，在租界内住进10平方米的亭子间，整天似生活在牢笼里。当时我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有4岁多，然而这次经历形成了我终身难忘的第一个记忆：逃难，在日本兵追赶下狼狈出走的逃难。战事平息后，我们回到嘉定，只见家中已被洗劫一空，父亲原来准备用以制造牙粉的材料洒遍室内外。我县首当其冲的娄塘镇小东街被烧光，北门外的店铺和房屋被夷为平地。嘉定人民永远牢记这"家破山河碎"的劫难，在这两处建立了纪念坊和纪念村，铭刻下日军对嘉定人民犯下的罪行。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燃起妄图亡我中华的侵略战争，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8月13日，日军集中陆海空三军向上海发动进攻；11月初，日军在金山卫登陆，上海即将陷入包围圈中。刚满10岁的我又经历第二次逃难，母亲带领我兄妹4人雇了一条小网船，西越沪宁铁路和吴淞江，驶向青浦、昆山两县交界的水网地区避难。我们的小船日停夜行。白天停靠在岸边树丛下，眼睁睁地看着日寇的双翼轰炸机俯冲疾下，投弹后翘首呼啸而上，弹落处水浪翻腾，不一会儿，河水泛红，向四周扩散，水面上飘浮起尸体和破碎物，顿时间呼喊声四起，嚎啕声撕肝裂胆。天黑以后，小船就解缆启行。开始一两天，看到的是我国的军队倒背着枪支熙熙嚷嚷地西撤；三四天后，所过的军队不同了，可隐隐约约地看到举着太阳旗的日军气势汹汹地向前追赶。此时此际，大人小孩都蜷缩在船舱里，不敢出声。逃难路上这种心惊胆颤的日日夜夜，如今仍历历在目，特别是日机轰炸后船破人死的惨状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扎得很深很深，以致在以后的几年内，我经常做恶梦，梦见日机从头顶上冲下来，吓得我半夜大叫起来。

1937年末，上海、南京相继沦陷，翌年初春，我们东归到马陆乡斜泾村外祖父家住，在兵荒马乱中过日子。白

天，要躲避日军的骚扰；夜间，要防备土匪前来抢劫、烧屁股。当时一听到日本兵来了，大人小孩无不惊恐万状。青壮年男女纷纷东躲西藏，以免惨遭拉伕和强奸；看门的都是老头老太太，但50多岁妇女惨遭奸污之事时有所闻，打家劫舍抓鸡拉羊的勾当则不必说了。我们十来岁的小男孩，总是被大人打发到村头路口望风，观察日本兵的行踪动向，一有危险动静就向大人通风报信。这种日夜不宁的日子有半年多，我家就搬回县城住，过沦陷区"顺民"的生活。进出城门要向日军鞠躬，还要被伪军抄腰包，无缘无故遭一阵耳光，还要向日伪军求饶，过的是受尽侮辱的"亡国奴"生活。

祸不单行。1939年底，当我读小学五年级时，接信说父亲病重，母亲决定带12岁的我去上海探视，由14岁的哥哥在家带领8岁和4岁的两个妹妹。自从1937年逃难后的两年多中，父亲只在1938年夏到过一次外祖父家，因此3岁的小妹妹在门口一见面，就回头奔告母亲：来了一个客人。是日寇入侵使父女都不相识。在沦陷区，汽油已成为军用物资而被统制，从嘉定到上海只有烧柴片的几辆小破车。待我们弄到车票赶到上海时，父亲已在常年蛰居的阴暗潮湿的小客栈中撒手西去，我们母子未能与他见最后一面。父亲是一个知识分子，早年和吴蕴初等在上海兵工学校攻读化学专业，毕业后曾当过中学教师，后回上海一家保险公司任文书一类小职员。"一·二八"战事毁掉了他想从事牙粉生产的全部积蓄，从此意志消沉，经常以酒浇愁；"八·一三"战争后，为了保持一个糊口养家的职业，他整年独居在小客栈中以酒慰孤独。据上海的亲友说，父亲患的是痢疾，但不久就死了。我不能不说，这是日寇的侵略战争害了他：一次是粉碎了他的实业梦，一次是夺去他年仅48岁的生命。

父亲的死，使我家的经济发生了严重问题，靠诸亲好友的相助决不是长久之计。经母亲四处托人，在1940年初，我兄弟俩辍学了。15岁的哥哥到马陆镇的一家棉花商行当学徒，13岁的我到上海汉口路一家棉布字号当学徒。从此，我结束了现在人们称之为花朵般美好的少儿时期的生活，走上了社会，开始领略多色彩的人生。

我少儿时期的苦难，在旧中国千千万万少年儿童中，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正是由这些大小不同的个人家庭苦难，汇总成了祖国的深重灾难。今天，生长在新中国的少年儿童是很难理解这一点的，这是我们有责任让他们知道的。

第二章　反　抗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回顾和思考我这8年中的人生历程，我们这一辈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得以发扬光大，从而增强了我中华民族素有的凝聚力。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力量，是我们取得民族独立并走上民主革命胜利道路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我是嘉定普通小学的四年级学生。6、7月间，突然自上海来了一群大中学生，他们到学校里教我们唱歌，唱的是今天令人肃然起敬的《义勇军进行曲》，以及永记不忘的《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等。还给我们放映无声电影，影片的结尾我至今尚清晰记得：孩子们把自己投蓄多年的扑满（积钱罐）高举起来狠狠砸碎，将洒向满地的铜板捡起来捐献给抗日义勇军。当时，静寂的嘉定小城也变得热气腾腾，十字街头经常人头济济地聚集听演讲。在毕业典礼上，我们四年级的结业同学和

六年级的毕业同学一起，高唱起浩气长存的《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唱着唱着，我们似乎和六年级的毕业生，和上海来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一样长大了，懂事了，知道我们要肩负起祖国的重任。现在细忆起来，就在这短短的十几天里，我们初次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在我还不足 10 岁的幼小心灵上，播下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种籽，等待时日的到来，它将萌芽、抽条、开花、结果。

我们中华民族从来是威武不屈的。日本帝国主义可以用武力来侵占国土，蹂躏生灵，但无法扼杀人民的反抗之心。1937 年 11 月，家乡沦陷，上海一带反抗日军侵略之火以燎原之势用各种方式在各种场合表达出来。

1939 年春，我因逃难停学一年半后在南门启南小学复学。校长在日伪政府规定的课本外，还到上海租界内的开明书店选购了一批国文活页文选作为补充教材，其中就有一篇法国著名作家都德写的《最后的一课》。这篇名著是写 1871 年普法战争中法国失败后，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划归普鲁士统治，那里的学校将停学法语而改学德语这一历史真实。《最后的一课》就是描述一个小学上最后一堂法语课时，悄静而严肃的气氛，老师讲课的悲凉语调和学生们茫然的思绪，使人充分遐想到这堂课结束后一切难以忍受的悲痛即将来临……当时，我们学这一课语文时，无论是课堂的气氛或师生的思绪，都和课文中的描述极为相似，隐隐约约地感到失去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的权利是何等的耻辱和痛苦。《最后的一课》确是一篇浸透着极浓郁细致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的佳作，老师用不着太多的解说，足已使我们这些小学生产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联想和与之共鸣的思想感情。无独有偶，当我后来进入上海工专学习时，我们的英文课本中也有《The Last Lesson》这一篇。5 年后再读此文，由于身受异国统治的痛苦增多，所能领会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也就更深了一层。更重要的是，从选编选读这篇课文的事例中，可以清楚地透视到中国人民反抗日军侵略的斗争通过各种方法表达出来。开明书店活页文选的编辑，高中英文读本的编者，小学的校长和中学的教师，都在默默地采取可能的方式履行着自己的民族责任，通过《最后的一课》，巧妙地表达和传播爱国主义的反抗侵略的思想。

1942 年秋，我结束了上海的学徒生涯，重新就读于勤业中学。枝茂实硕的良禾来自种籽和水、肥，参天盖地的大树赖其根系和土壤，我和我的同学们从各种方式接受到的爱国主义反抗侵略的思想教育，在勤业中学的学习日文中发芽抽枝了。1937 年抗战兴起，嘉定沦陷，创办已逾 10 年的县立中学停办了，有远见的家乡父老为了不使子弟们失学，依仗地方力量于 1941 年秋创办了私立勤业中学。学校处于日伪统治的沦陷区，课程设置中必须有日文课，并由日伪政府派来一个名叫仓寺仁一的日本人来教课。可是，同学们对学日文都似打了预防针般有抗"读"性，开始时对仓寺仁一直接反抗并发展到在课堂上互相扭打。后经校长出面圆场，同学们就像曾有约定似的予以消极抵制，致使每个年级的每个学期的日文课都是从字母学起，每个学期的终考也都是默写这些字母，但全班同学几乎都不及格。我是 1942 年插入初二的，英文是从 ABCD 字母学起，日文也是从アイウエオ字母开读，两年后我考入上海工专，英文已能阅读数理化英文原本，而日文的 40 几个字母仍然认不全、记不得。最近，

我们在京津的6个勤业中学同班同学聚会，又回忆起少年时学习日文的情况。当时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叶秉衡说:“我当时各门功课都是80分以上，唯独日文考试总是二三十分，仓寺仁一为了好向上交差，学期成绩单上日文也是七八十分，准予升级，准予毕业。为何在学习英文和日文上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一句话，就是大家不愿意学习日文，是一种痛恨日本侵略的心理驱使我们自发地拒绝学习日文。

今天，应该怎样看待我们少年时的这种行为呢？有个青年很不以为然地对我说：你那个时候如果学好一手日文，现在说不定是个大拿呢?! 出国就更不成问题。这话可能代表着今天改革开放年代的一部分青年人的心态，但历史是无情的，什么事情都不能离开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人是一个社会的人，当自己的国土惨遭敌人的铁蹄践踏，自己的父老乡亲痛受日军的侮辱残害时，我想当时是很难把自己置身于超然的地位去把日文当作一种将来有用的工具而潜心学习的。更何况，我们当时还只是一个刚刚步入青年的初中生，血气方刚，处事常常在是与否的两端选择。记得当时有的同学按仓寺仁一的要求能读出课文时，我们就讽刺他想当“翻译官”，这样讽刺人家今天看来无疑是过于简单化了，或许还会伤了他的心。但总的来说，我们绝大多数同学采取抗拒学习的行为，在当时是一种能够表达自己爱国主义反抗思想的合理方式，是反映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正常心态，正如《最后的一课》给予的思情一样，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应该给予肯定的。

当然，我们这些中学生抵制学习日文的反抗行动，与当时发生和发展于我县西乡的外冈游击队、江抗和新四军的武装斗争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这总归是我中华民族反抗日

军入侵统治的一种表现。从一个世纪前的甲午战争起，嘉定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生发着和积聚着一股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精神力量。50多年前开始的这场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抗战，无论从前线到边疆，从沦陷区到大后方，从抗日根据地到国民党统治区，全民族都是由这种反抗精神动员起来了。而且，也是由这种反抗精神和行为的真诚程度和正确程度，决定着中国人民对社会政治力量的拥护或鄙弃，判别谁顺应民心谁背逆民心。我们这一辈人就是在这种反抗精神的薰陶感染下成长起来的，抱着挽救民族危亡和期望祖国富强的满腔热忱去面视社会、面视人生的。因此，当《最后的一课》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时，我们进行尽可能的反抗；当抗日胜利到来之时，我们雀跃欢呼地庆祝；当身陷敌区而仍勤奋攻读的青年学生，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受了"奴化教育"需要"甄别"的伪学生时，被激怒了的我们理所当然地起来反抗；当国民党反动派有悖于中国人民强盛祖国的愿望而发动内战时，我们就毫不犹豫地高举反内战的旗子；当美帝国主义者妄图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来抑制中国和亚洲人民觉醒时，我们大义凛然地举起反对美帝扶植日本的大纛。总之，我们顺应中国历史的潮流，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走上正确体现个人人生价值的道路，汇合到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的洪流中，为揭开中华民族发展的新篇章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三章　警　钟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人们不禁要问：中华民族曾经遭受的苦难历史是否还会重演呢？

这50年来的国际格局，确有令人鼓舞之处，没有出现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到20年就形成的凶险局面。中日两国的关系，由于我国始终采取正确的政策，经过两国民间人士广泛的努力，自70年代重建正式外交关系后，总的发展是和平友好的。但是，现实也不断向我们发出警报，今天还是不能高枕无忧呀!

种种事实表明，让我国和亚洲各国人民深感不安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的性质和所犯罪行的责任，至今并未得到日本全国各界上下特别是政界领袖人物一致的认同和谢罪，更没有使日本国民特别是年轻一代掌握和认识全部历史真实。

1972年，日本与我国外交关系正常化后，执政的自民党政府首相在谈到8年侵华战争这一历史事实时，总是以"过去对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类不痛不痒的话来敷衍过去，从未正式承认过发动了侵略战争，更不要说进行反省和谢罪了。90年代后，相继出任政府首相的细川、羽田和村山，承认了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但遭受到右翼分子的恐吓和攻击，一个右翼狂热分子扬言要射杀细川。自民党的多数国会议员反对村山提出的"不战决议"，反对反省和谢罪，这是今年日本政坛上最引起国际注目的争论，也最能反映日本政治势力的现状。1994年，有3个政府阁员连续跳出来声言，"日本没有侵略过东南亚"、"日本不是侵略国"、"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等等。令人吃惊的是：前一个刚因发狂言而被迫辞职，后一个照样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鹦鹉学舌，这只能说明这些右翼分子是有恃无恐和冥顽不化，死抱着军国主义的亡魂不放，舍此还能有何别的解释!

从日本东京每年一次的参拜靖国神社活动中，也能够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视到一些政界领袖和众多国会议员对待侵略战争的态度。日本的靖国神社中安放着被称为有护国功勋的英灵神位，其中就有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等战争罪犯。日本政府的内阁要员和国会议员等，每年都有相当多的人去参拜，不论他们以阁员身份或是个人行为，去向这些战犯亡灵顶礼膜拜，都说明了他们对侵略战争的心态，明显地表示了决策者的一种鲜明立场。

这些政坛右翼人物还不让日本国民后代了解历史真相。人们还能清楚地记得80年代的教科书事件。在当时由文部省审定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把日本组织重兵进攻中国并占领了半壁山河的侵华战争，竟轻松地说成日军"进入支那"，引起了我国和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时至今年，少数政客仍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出发点是为了亚洲的安全"、"把亚洲各国从欧美殖民势力下解救出来"、"亚洲各国纷纷独立，就是受了大东亚战争的影响"，如此等等"侵略有理"、"侵略有功"的谬论，不一而足。一个国家用什么样的历史教育自己的国民，特别是年轻一代，是确切反映了执政者的现实政策和追求目标。日本政界人物用隐瞒和歪曲历史事实的手法教育其国民，其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同样，在怎样对待原子弹爆炸问题上，也反映出这些人物的心态。日本每年都要在广岛和长崎举行原子弹爆炸纪念日，活动的策划者总要让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及其后代，诉说受到伤害的悲惨景象，但都从来不说原子弹为什么会投到日本国土上。广岛和平纪念馆的原子弹爆炸展览也是片面的，掩盖了日本对外国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回避了日本人民受到原子弹伤害的真正原因。

为什么日本这批右翼人物总是不承认铁证如山的侵略事

实，并且要千方百计地蒙蔽国民呢？他们是代表抱着军国主义阴魂不放的法西斯分子，还是以“田中奏本”的总目标行事，总认为日本应成为“亚细亚领袖”、“东亚盟主”，总感到“在岛上有诸多不便”，还想做已被历史所粉碎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台湾的学者在纪念马关条约百年的讨论会上指出：台独意识是外来的，日本就是背后支持的主导者之一，目标是想把100年前夺得的、50年前归还中国的台湾重新控制在手。蒋纬国也著书指出：台独走向“皇民化”，日本培植了一批恋日者，一意想把台、澎重入日本的掌握中。新加坡的前总理李光耀说得好：“日本的这批政客们不让年轻一代掌握和认清历史上的重大是非，日本将有重蹈覆辙的危险。

但是，我国要防止这一苦难历史的重演，最主要的还是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首先，要强盛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要让一代一代的年轻人都知道，祖辈们曾经遭受过怎样的丧权辱国的苦难；为了摆脱半殖民地和半亡国的境地，他们曾经反抗、失败，奋斗、再失败，再反抗，经过了整整50年、100年、150年的漫长历程，今天才得以在独立和富强的大道上前进。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当“洋货”、“洋人”、“洋思想”汹涌进入之际，我们中国人都要有一根主心骨，不卑不亢，坚持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国家的信念。这话不是老生常谈，也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我们要做到的座右铭。不是吗？伴随着改革开放，曾经出现过“崇洋热”，“崇洋热”又发展为“出国热”，“出国热”又反馈为“中国落后论”，甚至“当外国人为荣”；有些人明明是贪恋物欲，却还要叫嚷“回国没有我工作的条件”等等，还大言不惭地说什么“将来都要世界大同”。这一切都告诉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是千万不能疏忽的。要让他们明

白，今天侨居国外的炎黄子孙能得到尊重，过得自在，完全是由于今天祖国的强大；忘记了过去，没有祖国为后盾，就不能把握住现在和拥有美好的将来。

“落后就要挨打”，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仍然是一条铁的规律。要避免苦难历史的再演，最根本的是要迅速地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和科技实力，真正使我们这个12亿人口的大国屹立于不败的基地上。这是一个扎扎实实不可图虚名的长期艰苦奋斗的事业，有赖于我们全体华夏儿女，包括侨居在外的具有一颗中国心的炎黄子孙在内，同心协力抓住现在的良好机遇去实现。每一个有志气有作为的中国好儿女，一定会在追求祖国集体目标的历程中，实现个人的利益和人生的价值。我们坚持改革和开放，决不重复过去盲目排外的错误，要把世界上一切最有用的“洋货”、“洋人”、“洋思想”、“洋技术”都引进来、学到手，用以建设我们的祖国。我们决不简单地批评“出国热”，而是诚恳地期望出国后要勤奋学习，在学有所成后返回乡土为祖国效劳，不要等待“有了工作条件”才回来。新中国成立前后回国的老一辈科学家们，他们冒着危险回国时有什么现成的工作条件？他们不计个人名利得失，踏实地工作，为今天的建设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包括为培育年轻人出国创造了条件。当代年轻人要懂得，“创造工作条件”本身就是一个创业者议中之题，他们是决不会甘心坐待“有了工作条件”才去创业的。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如果说应该记住点什么，强调点什么，我认为：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决倡导以人民利益为重，建设苦难深重的祖国，实现中华民族之飞腾，应该成为我们当今几代人的主旋律。

写于1995年4月25日

日本侵略军在嘉定犯下的罪行

肖银摘编

日本侵略军两次侵占我们嘉定。

第一次，1932 年 1 月 28 日，日军在上海悍然发动武装进攻。史称“一·二八”战争。是年 3 月 3 日侵占我县。

2 月 21 日，日机轰炸南翔火车站，站长徐文斌等 20 余人殉职。3 月 2 日下午日机 12 架穿梭轰炸嘉定城区，100 余幢房屋被毁。午夜，日军从浏河口登陆，1000 余日军直扑娄塘、朱家桥，娄塘小东街 70 余家房屋被毁，朱家桥镇南北两街 100 多间民房毁于战火。3 月 3 日早上日军分兵直扑县城，东门、北门外的民房、商铺及斜泾村均被付之一炬。同时南翔镇也被侵占，3 月 4 日黄渡、安亭也落入日军之手。

5 月 5 日，国民政府同日本政府签订屈辱性的《淞沪停战协定》，9 日下午犯境日军全部撤走。

这次被日军侵占历时 67 天。据《上海撤县区域接管实录》统计，全县受灾户 29,355 户，死亡 464 人，毁房 2,549 间。

第二次，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军在上海挑起侵略战争。史称“八·一三”战争。国民政府第十五集团军在我县安亭镇设立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第五十一、五十八、九十八

各师陆续开抵本县奋起抵抗。8月23日，日军窜犯罗店镇，遭国军狙击，爆发了空前激烈的罗店争夺战。本县境内的曹王庙、施相公庙成为主要战场，日机狂轰滥炸，日落弹500余颗，蒲华塘一带被夷为平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日军还毫无人性地施放两次毒气，致使军民数百人中毒死亡。期间，日机多次疯狂地轰炸县城、南翔等地，被毁房屋难以计数，南翔苏民职业学校中弹10余枚，校舍和教学设备悉数被毁，经济损失10余万元。

11月12日嘉定沦陷。

“八·一三”战争，本县东部与南部广大地区先后成为激烈战场，蒲华塘两岸杨泾以西，南北15公里的万余农屋全部毁于战火，数以万计的人民无家可归，县城、南翔、马陆、真如等城镇屡遭日机轰炸，满目疮痍，全县死难平民4000余人，受伤1.7万余人，财产损失难以估计。

据嘉定县政府民国35年（1946年）《嘉定县历年遭受敌人屠杀及暴行调查统计》称：自民国26年（1937年）8月至民国34年（1945年）全县惨遭日军杀害的有1.66万余名，其中男9475名、女6000余名、幼童1108名。遭枪击、殴打致重伤的有2.4万余名，其中男1.11万名、女1.2万名、幼童938名；轻伤的有2.59万余名，其中男1.45万名，女1.02万名、幼童1216名，尚有440名生死不明。沦陷8年，全县平均每年有2070人被日军杀死，其中民国26年（1937年）多达4330名，占当年全县人口总数的1.57%，受害致伤平均每年有6251名，其中民国26年（1937年）多达1.72万名，占当年全县人口总数的6.26%。

日本侵略军在嘉定犯下的累累罪行，罄竹难书，因限于

篇幅，仅择几则有名有姓，有时间、地点的实例摘录于后，以示其残暴。

1932年3月3日，日军18名，从浏河沿新泾东岸进入徐行镇，一路杀人如麻，至毛家宅（今联民村）枪杀农民徐汤云，至吉家宅（今田家浜生产队），枪杀农民吉锡全，进入徐行镇上，枪杀居民单亦甫、单殿笙、杨阿二、陆允九、张鹤华5人，进斜泾村（今永胜村第一生产队）集中枪杀村民27名，焚毁房屋26间，全村仅剩半间房屋未毁。

1937年8月某天下午，唐行双塘大宅（今双塘村十二队）农民6人在大树底下纳凉，突遭敌机轰炸，6人血肉横飞，无一幸存。

1937年10月27日，日机轰炸安亭镇镇康弄，11月8日、9日、10日连续3次轰炸严泗桥、马家弄及东街典当场一带，被毁房屋1000余间，死4人，伤1人。

1937年11月6日，一队日军突然包围花家桥（今江桥镇丰庄村花家桥生产队）将村中老幼村民22人集中关押，翌日3名日军轮奸了一名15岁少女，9日上午日军将关押的村民一一拉到村边用刺刀捅死，死难19人，年龄最大的84岁，最小的只有2岁。村民郁同康一家除本人外出幸免外，父母妻儿老小7人都惨死在日军刺刀下。10日，日军又将花家桥25间房屋烧成一片焦土。

1937年11月11日马陆乡李家村八字桥（今马陆镇李家村）陆祥荣、陆洪兴、陆阿度、陆雪生、姚阿秋被日军绑到陈家行葛家宅塔浜头坟地杀害。12日农妇蒋阿娣和12岁的儿子下田种麦，又遭日军杀害，14日上午陶小囝婆媳在田里摘棉花，儿媳遭三名日军轮奸，婆被枪杀于田间。

1937年11月13日下午，驻八字桥（今唐行镇连俊

村）一股日军将该村农民王建章、金玉成、王福泉、项锡爵、蒋文华等共33人抓走，枪杀于八字桥河东。

1937年11月14日，驻安亭镇天主堂里的日军，将路过的农民朱腊梅、黄阿大、小狗等8个青年，抓起来拷打，人人被打得皮开肉烂，之后，又把他们拖到严泗桥上，用绳子捆绑住双脚倒悬河中灌水，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最后被拖入桥北葛家天井一一杀死，被害者有的生殖器被割掉，有的身首异处，有的被割去耳朵、挖掉眼睛，惨不忍睹。

1937年11月某日，一队日军窜到朱家桥镇上抢掠，抓住几个年轻妇女，用刺刀逼迫她们脱掉衣服，裸体游街，在光天化日之下，有2个妇女遭到了日军轮奸。1937年11月16日，7名日军窜入安亭镇东市梢钮宅，酗酒后将钮姓全家连同邻居共15人拉到门外枪杀，除2人未中要害幸存外，13人遇难，后人将死者掩埋在一起，称之谓"13个人坟墩头"（堆）。

1945年4月，马陆陈村陈阿松、陈松柏、赵老友等6个老人在广福镇茶馆店喝茶，一队日军自刘行窜来，6个老人向杨泾河北回避，遭日军机枪扫射，无一幸存。

日本侵略军在嘉定犯下的罪行，嘉定人民永远不会忘掉。

毋忘日军暴行

张服膺

(一)

1937年"八·一三"抗日战争在上海爆发后，沪郊重镇交通枢纽的南翔镇，一直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战事爆发不久，几架日机首次向北市梢黄金桥东的南翔红十字会救护队投掷了几颗炸弹。此后敌机经常不断轰炸南翔。我家住在二房村，离南翔约3华里，敌机来时就能听到看到。我总是躲在村边竹林里，向南翔上空窥望。10月初，日机群狂炸南翔。只见日军大型轰炸机（那时人们呼之为"意大利飞机"）飞得很低、很缓慢，一架跟着一架自西向东，再自南向北，反复循环投掷炸弹，随着一团团黑烟冲起，一声声闷雷般炸弹爆裂声传来，不知有多少房屋被毁，不知有多少人被炸死、炸伤。不知南翔镇炸成什么样子了？我尤其惦记着母校——苏民职业学校是否受损了？当时我的抗战情绪很高，常常帮助村上驻军找民工、找向导，有时我也主动当向导，送给本乡蓝晒地图，并协助向村民宣传防空防炮知识等，时间一长，同驻军的军官较熟。有一次驻军乘民船去南翔领军用品，我就搭船到北市梢的轮船码头上岸，一路上到处是瓦砾，没遇见几个市民。走到苏民职业学校门口一看，傻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